

鐵琴銅劍樓

研究文獻集

九四愛顧廷龍著



仲伟行 吴雍安 曾康 编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鉄琴銅劍樓研究文獻集

仲照題



仲伟行 吴雍安 曾康 编著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

仲伟行 吴雍安 曾 康 编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75 插页 4 字数 296,000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25-2181-8

K·236 定价: 28.00 元



铁 琴 铜 剑 楼 外 景



铁 琴



虹 月 归 来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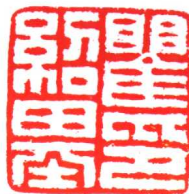
1988.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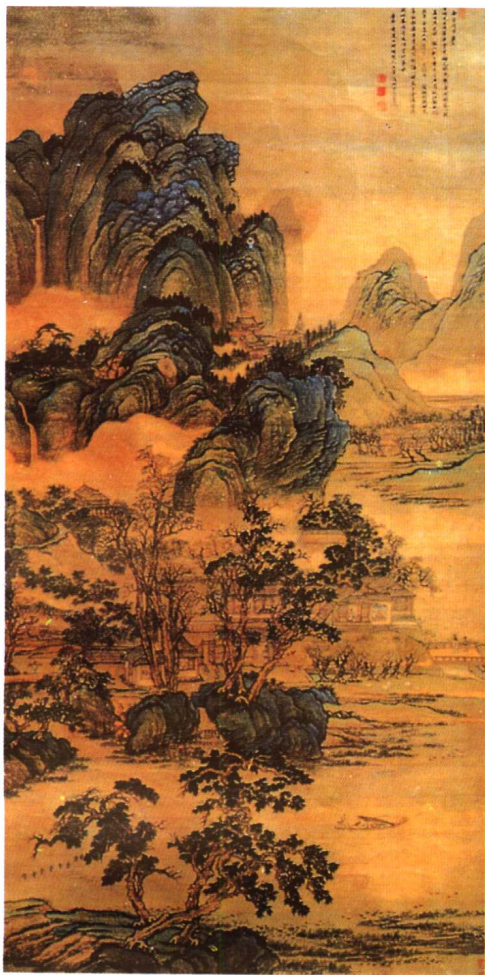
瞿 启 甲 手 书 对 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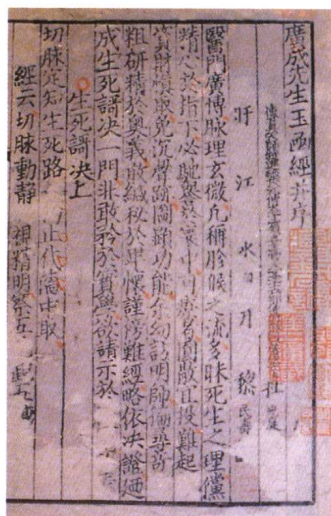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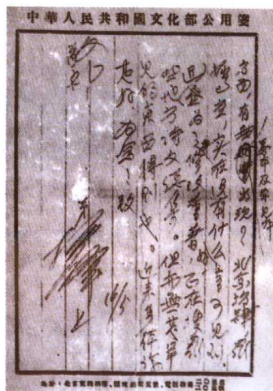
翁同龢为瞿氏藏书楼手书对联



铁 琴 铜 剑 楼 藏 书 章



铁 琴 铜 剑 楼 收 藏 之 王 翠
《 芳 舟 图 》



铁 琴 铜 剑 楼 收 藏 之
宋 刻 《 玉 函 经 》 书



郑 振 铎 与 瞿 凤 起
信 函 原 件



瞿绍基



瞿镛



瞿秉清



瞿启甲



瞿济苍



瞿旭初



瞿凤起

序 言 一

钱 仲 联

人间事物亿万，各有发展之轨辙，先河后海，斯恒理也。今言藏书，必先有众多之文字，而后有以文字记述之书册，有书册然后有收藏。书而至于藏，需藏书之府与专司之人。在古代物质文明之制约下，又必先有国家之藏书，然后进而有私人藏书。远古王朝，夏代今无实物之文献可征，无从言藏书问题。至于殷商，今有出土之甲骨文字，又有传世之《尚书》足考信其史实，《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既有先人之典册，理应有藏之之府。殷商藏书之府如何，今无可考也。迨周代而中华文化进一步拓展，征诸记载，藏书有府，已可考知。《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东还，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群玉之山，……阿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之所谓策府。”晋郭璞注云：“言往古帝王以为藏书册之府，所谓藏之名山者也。”先王，往古帝王，言周之先王也。《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唐司马贞《索隐》云：“按藏室史乃周藏书室之史也。”由此可知周代已有藏书之府，并有司其事之史官矣。而当时之书，乃书于竹简者，藏大量竹简之书府，惟王家之力始能举之，故天下之书府不可能多。至于秦、汉，而藏书之业大盛，秦之石室、金匱，西汉之石渠阁、天禄阁，东汉之兰台、东观，皆国家藏书府也。西汉末刘向、刘歆资以探讨，成《七略》，校讎目录之学生焉。由于封建文化之繁荣，书写工具之发达，书籍由竹简而卷轴而板刻，不断变化完善。得书藏书，非如往者之难，于是官府藏书而外，私人藏书复踵其后。如南朝梁人任昉，聚书至万卷，率多异本，卒后，武帝使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无者就其家取之（见《南史·任昉传》）。

唐人柳公绰家有书万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贮库，其副常所阅，下者幼学焉（见《新唐书·柳公绰》）。李泌父承休聚书二万余卷，诫子孙不许出门，有求读者，别院供馔（见《李邕侯家传》）。自南北朝以来，私人藏书家建藏书室之事亦兴起，北魏平恒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见《魏书·平恒传》）。唐代私人藏书家又有藏书楼命名之事，如李磾家有书至万卷，世号“李家楼”（见《新唐书·李磾传》）。下迄清代四大藏书家，法乳相承，踵事增华，吁其盛矣！

海虞瞿氏铁琴铜剑楼，四大藏书家之翹楚也，亦海虞藏书家之近代鲁灵光也。海虞，旧滨江一小邑耳，而自仲雍、子游以还数千祀，昔称学道名邦，今为文化名城。旧家藏书，则自明末清初以来，钱谦益绛云楼、毛氏汲古阁、钱曾述古堂，名显全国，不囿一邑。嘉、道以还，借月山房、爱日精庐、稽瑞楼、旧山楼等，为数蕃夥。然或遭火灾，或经战祸，或子孙不能世守其业，藏书散失者亦匪鲜焉。至言规模影响之大，更不能与瞿氏匹。尝试论之，铁琴铜剑楼者，私家藏书，而不为私者也。于藏书楼所在，固尝公开其藏书，供读书人士前往浏览、校勘、转钞、参观，俾书得其用。一也。瞿氏精印《宋元善本书影》，收宋本一百六十一一种，金本三种，元本一百零五种，以饷海内外人士，沪上《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之编刊，楼主人瞿启甲不仅为发起人之一，且为“丛刊”等之编，提供所藏善本不少。二也。尤其是楼主人瞿启甲爱国精神之强烈，良足廉顽立懦。在民国时期，启甲为国会议员，拒受曹锟贿选总统之贿金，拂衣南归。秋津敌骑寇华时期，启甲坚持民族气节，并保护藏书，不落敌手。新中国成立，启甲三子：济苍、旭初、凤起，秉承遗志，以藏书捐献国家。宋、元、明善本古籍归北京图书馆；一部分书捐入常熟市图书馆。清末归安陆氏皕宋楼藏书，尽数售给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岛田彦桢《皕宋楼藏书源流考》称为人世大快事，彼之快事，我之奇耻也，瞿氏视之，足以自豪矣。

今者，海虞仲伟行、吴雍安、曾康诸君子，编纂《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洋洋三十万言，内容丰硕，材料翔实，分类有法，系统完整，文笔优美，盖国内首次编撰之有关铁琴铜剑楼文献专集与学术

研究成果,并为国内首次编撰之藏书家专志,具有较高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其有功于海虞文献及国内外书林,固不待言矣。书将绣梓,伟行问序于余,余与旭初、凤起缔交数十年,海虞又为余出生之地,舅祖翁松禅老人与瞿氏夙有交往,见于日记。今余为是书引咍,佛说时节因缘,盖有以也。

旃蒙大渊献相月钱仲联书于苏州大学中国近代文哲研究所,时年八十有八。

序 言 二

许 培 基

闻名于世的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常熟古里瞿氏铁琴铜剑楼，四代传承，为中国学术文化作出之贡献，彪炳千古。1986年，常熟市党政领导，为使这一文化遗址，传之久远，昭示后人，拨专款修葺。1990年决定辟为纪念馆。常熟市图书馆仲君伟行，以所拟之史料陈列提纲见示，余不揣翦陋，曾为之作删改增补，并参与开馆之盛典。斯时也，佳宾云集，共赞常熟特有的历史人文景观，抚今追昔，感慨系之矣。中国的藏书事业源远流长，历代皇家官府之藏书，为中国古代藏书事业之主流，而自唐、五代以来，私家藏书事业绵绵不绝，与皇家官府之藏书交相辉映，使表征中华文明之文献，得以保存至今而不坠。皇家官府之藏书，见诸史籍之记录较为详备，而散于全国各地之私家藏书，史籍、方志仅记其鳞爪，清末叶鞠裳氏首先注意及此，竭八、九年之力，“自正史以逮稗乘方志，官私簿录，古今文集”网罗遗闻，捃摭逸事，撰成《藏书纪事诗》七卷，收录五代至清末藏书家一千一百余人，是研究我国历代藏书史及私家藏书的一部开创性的专著。自叶氏以后，也出现多种研究私家藏书之专著，然大多因袭叶氏之说或作地域、时代延伸之增补，于编著的体例上，对某一藏书家，大多是史料之概括而语焉不详。所以，仲君伟行等，于铁琴铜剑楼纪念馆陈列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钩稽史料，汇成专集，开展对某一著名藏书家的个案研究，对中国私家藏书之研究，另辟蹊径，亦可谓独具只眼之有心人矣。此书融瞿氏世系、藏书源流、瞿氏著述、诸家题咏、后人研究评述于一炉，脉络贯通，条分缕析，使此藏书名楼之全貌，前贤穷搜二酉，终至化私为公

之心迹，灿然具备矣。仲君伟行以此书之成稿见示，并索序于余，因
赘数言。

秀水许培基书于苏州市古籍馆
一九九五年九月十八日

前 言

中国历史上的藏书事业是世界上最早、最系统、最为发达的文化事业之一，在世界文明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而私家藏书自春秋战国时期与皇家藏书分流以来自成体系，对中国文化史有着特殊的贡献。素以“学道名邦、藏书之乡”著称的常熟，在这一系统中有其鲜明的“个性”，体现于两大因素：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积累深厚的人文环境，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藏书大家，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瞿氏铁琴铜剑楼之所以能长久绵延的客观历史原因。也正因为有像瞿氏这样的藏书家的支撑，才使历史藏书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以镜为鉴，可滋发凡。全面研究私家藏书的兴衰史，对我们全面了解社会发展、社会生活，完整认识文化学术史面貌，总结爱书读书治学精神，光大中国文化优秀传统文化，追踪人类进步、历史演变的足迹，是大有益处的。瞿氏铁琴铜剑楼是私家藏书的历史代表，她曲折绵延了一百九十多年，对其个案剖析，更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私家藏书发展轨迹，从中了解民间藏书的历史，了解中国藏书史的发展，更可探索到中国历史藏书演变的过程以及中国图书馆从私家藏书楼转化的过程。这也正是我们编撰本书的宗旨。

清人洪亮吉(1746—1809)及叶德辉(1864—1927)以藏书家的旨趣和成就将藏书家类分为著述家、校勘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五类(《北江诗话》、《书林清话》)，今人许培基先生以藏书家之社会及学术地位，将藏书家分为三类：一类是仕宦藏家，从政之余，别研图籍，退隐之后潜心聚书；二类是宿学藏家，绝意仕途，以聚书著

述自娱；三类是贫寒学子，聚书治学（《苏州市志》）。程焕文先生也从藏书观角度将藏书家分为“开放派”和“保守派”两类。从瞿氏数代之社会地位看，第一、二世主人曾跻身仕途，但均无意为宦，一试职便归隐，以聚书读书校勘著述自娱，以成为一方藏书大家而自豪。至启甲一代，虽作为本邑开明士绅，亦参政议政，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其更以谨守藏书祖业而自勉；从瞿氏为人处世看，历代主人热心公益，乐善好施、赈灾救贫、修桥筑路、募捐援急诸善举口碑传颂，更有藏书供人借阅饱览之美谈。特别是近代以来，在强国强民意识支配下，启甲将家藏供社会共享，成为常熟市公共图书馆首任馆长，发扬了我国“以一人之举，博万人之悦”的优良传统；从瞿氏之收藏精神看，他们将藏书活动作为一种历祖历宗传承的事业来看待，生活上保持了“一裘三十年”之古朴家风，以田产租米敛财，而不惜用于购置书籍文物，搜罗珍善秘本、金石古印、书画藏扇，使祖国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得以流传百世；从瞿氏之学术地位看，除藏书家本身勤奋读书，校勘著述历世不辍外，他们尊重人才、延聘高手校勘编目，与叶昌炽等著名学者“谈晁陈之学，相得甚欢”，成就了著名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等；从瞿氏与其他藏书家的关系看，瞿、陆、丁三大藏书家之间就有相当友好的往来，本书“相关文献实录”就提供了这样的佐证。这种藏书家之间的交流交往、互通有无，互相促进，可说是一条私家藏书逐渐向开放型发展的重要特征。综上，瞿氏可说是集著述、校勘、收藏、赏鉴于一身的开放派学者式藏书家。

从铁琴铜剑楼收藏的传承流布脉络可以看出，瞿氏竭尽几代人的毕生精力，执着痴情，上下求索，精心聚敛，尽力呵护，才使藏书完整地留存世间，才使现代人有幸看到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前的人类文明的结晶。与那些藏书及身而散或子孙不能世守者相比，这就是瞿氏与众不同之处。何以能传承五世，历久不散？除了地区经济的发达、人文环境的优越、社会习俗异于他方；除了社会相对安定，可置千顷良田耕读成家，为藏书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之外，主要原因还在于其内在的决定因素，就是瞿氏出生书香世家，从小

接受浓厚的文化氛围的严格的庭训家教,对祖业家藏视作自己的生命,珍爱备至,有一种不辱前人,为民立业的内动力,更有不畏强暴,不屈外力的民族自尊自爱的心理素质。珍品的固守,锻炼了他们专一的品性,凝结了他们执着的毅力,那种藏家与藏书血肉相连、共生共长,兵燹灾祸之中生死与共的精神是动人心弦的。珍藏的捐献,又突现了他们的高风亮节,完善了他们的人格。那种对祖国母亲永恒的爱是感人肺腑的。

关于献书史实,在清末四大藏书家中,仅瞿氏有此一端。应该说,四十年代,瞿氏五世楼主瞿启甲作为国会议员,已看到了社会之动荡变革,必将带来新的结果。他十分希望出现清明的政治,国家民族才有希望;他作为县公共图书馆馆长,已看到了公共图书馆的优越性,人民对藏书的迫切需求,其临终遗言“书勿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可见已悟出私家藏书之必然出路是“归公”,这才是藏书最好最圆满的归宿。这也是瞿氏与其他藏书家藏书出路之所以有所不同之根本所在。

对这样类型的藏书世家作综合性研究,因年代跨度大,历史资料零散,非投数年搜集之功、非经几番爬剔梳理,难成其事。我们本着“存史实,资考证”之目的,一是重视史料真实性,以原始文献为主,辅之以其他参考资料。二是注重资料的全面性,不仅注意收集瞿氏历世藏书活动系统资料,而且注意搜集其与藏书相关的活动资料,如与出版刊刻事业的相互支持、与近代图书馆的兴起、与近代文化学术发展的相互影响依托、与藏书同样珍爱的其他收藏等等史料。全书分为九章(附录一章),从反映其藏书活动特定内容的书楼开始,探究其过去和现状。对记载瞿氏楼主世系的史料的取舍,本书尽可能采用碑铭、志传及瞿氏后人撰述之参考资料,以一次文献为主的形式呈现其本来面目,不加修正。如记载缺失,则参考各工具书资料,以撰写为主;如无工具书记载,则以口碑传说作参考。因为口耳之间有价值的资料也是文献,同样可资考辨、整理、研究与利用。瞿启甲乃近世著名人物,其方方面面涉及较广,故除以其子凤起先生所撰传略为主,还辅以“民国议员”、“红十字会

长”、“图书馆首任馆长”等史实,以全面反映人物面貌,对研究其藏书事业有所裨益。

清代藏书家的藏书来源方式与现代不同,私家藏书的特点是以传承、传钞、搜辑、访购等方式积累,为清晰反映其藏书来龙去脉,书中根据零星的历史文字记载,对部分内容采用了图表的形式,将复杂的事由分层次列出,供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以便识者一目了然。另外,在献书一节,也引进数学统计方法,力图使书籍分类条理清晰。当然,这些仅是在历史藏书研究中作一点探索尝试而已。

作为清末著名藏书世家,因爱书而藏书、而读书,由校勘而影钞、刻印流布。瞿氏尤其重视目录版本解题之学,仅编著目录就有十九种,为后人提供了了解、研究其藏书面貌及学术方向的真实依据,也为当时学林传播文化典籍起到了指点门径的作用。而《宋金元书影》的汇辑,《集古印谱》的编辑等等,则从横向角度对其藏书加以探讨。因此,瞿氏在学术方面的贡献,虽不如黄丕烈、顾千里那么显著,但他们“振二古之宗风,为三吴之后劲”,也是平凡而极有价值的。本书将其精钞目录、刻印目录、襄助出版书目以及编著目录、校跋书目、文存题录等,广泛搜集,校核查考,标点整理,分类编排,供研究参考。

伴随着瞿氏藏书事业的发达、发展,记录着铁琴铜剑楼藏书事实的“序”、“记”、“题”、“跋”为数不少,如《藏书目录》之前序、后序,《书影》之序跋等等文献,具有面广量大、针对性强的优点,为后世保存了关于藏书世家当时的历史概貌和具体资料,成为别具一格的有效的史料积累。《古里瞿氏四世检书图》题跋最具特色,本书对其辑补标点,列为专章,成“吟咏”一节,从中不仅可见一家兴衰之迹,且能从一个侧面考见中国文化学术进退盛衰之迹,为研究历史藏书提供重要依据。

瞿氏后代既能守业不怠,藏书不散,又能秉承遗志,捐献宝藏,对国家对人民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们在整理资料时,尽力还其本来面目。因一般记载均粗略记载献书情事之大概,而忽略其数量的正

确性,能弄清瞿氏后期历次献书书目及数量,对考证铁琴铜剑楼藏书可提供研究依据。故此章能列确数则不敢擅改,能列详目则不厌其烦,俾使研究者了解其献书的数量和质量。透过这些浸透了瞿氏心血手泽的书目,可以认识一代藏书家的爱国之心。

从清代至今,后人对铁琴铜剑楼的研究方兴未艾,有叶昌炽、叶德辉、陈登原、陈从周等著名学者,也有国外专家,限于搜集范围、时间精力,仅就所见罗列题录,更限于篇幅,未收录原文,好在有检索门径,另列有参考工具书目录,当无碍研究利用。值得一提的是,英文和日文研究资料来之不易,也使本书增色不少,可惜限于客观条件,尚不完全,聊备开拓思路,仅供参考而已。

铁琴铜剑楼,她端庄而古朴,默默地收藏着历史,她栉风沐雨,艰难地走到了今天。她是历史的教课书,她是精神文明的积淀,她是文化遗产的标志,她更是古国文明的象征。她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是无形的,她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是发人深思的。如何变无形为有形,这正是当代人应该回答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满足对历代藏书事实的钩隐索微,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简单地对藏书家事迹的宣示弘扬。我们要站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来俯视中国藏书现象的发生、藏书活动的发展和藏书事业的发达,我们要总结其间的兴变盛衰规律。如若本书能成为深入研究者之台阶,则可聊以自慰了。

在常熟党政领导和各界人士的重视、支持、关怀和努力下,铁琴铜剑楼纪念馆建成了,为我们从外在形态上领略和认识铁琴铜剑楼提供了机会,但铁琴铜剑楼丰富的精神内涵尚待我们去深入挖掘和传承。

仲伟行于游文书院
一九九六年元月